

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及路径

戴 翔

(南京审计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贸易作为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正深刻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也是推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和途径。为揭示数据要素流动对生产力跃迁的关键作用,阐明数字贸易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核心地位,并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把握战略机遇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本文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逻辑、世界经济的历史逻辑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三重视角分析,将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概括为“流动”,并据此系统探讨了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时空跨越性等特性,其跨境流动能通过“网络协同效应”和“熵减效应”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数字贸易的广义范畴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其发展水平与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提升呈显著正相关;第三,我国需构建“数字丝绸之路+DEPA 框架”的双循环路径,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改革。结论表明,高质量开放条件下的数字贸易可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速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据此,中国在新一轮开放发展的进程中,应更加重视数字贸易,即在高质量开放中推动基于数据的数字技术及其创新活动的流通与集聚,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数字贸易;新质生产力;数据流动;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F0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4-0069-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407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背景下启动的。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几十年推行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发展战略,不仅契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呼应,精准把握住了国际分工演变的关键机遇,进而显著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在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已经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的,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1]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所在,其背后的逻辑意蕴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然而,张二震指出,“封闭必然导致落后,但开放并不必然带来发展”,“只有在条件具备且战略得当的情况下”,才能把握和利用开放发展的战略机遇^[2]。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实际上正是源于我们采取了既适合特定发展阶段,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开放战略。从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来看,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的背景下,数字贸易无疑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

收稿日期:2024-05-22

作者简介:戴翔,男,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江苏新时代自贸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制度型开放提升制造业价值链韧性的机理、效应与政策优化研究”(24CJL014)。

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开放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赋能作用。由此,一个兼具重大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随之提出:数字贸易如何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内在逻辑究竟是怎样的?同时,在操作层面,我们应如何选择合适的路径以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一、文献回顾

聚焦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及路径问题,目前虽然没有直接的专文探讨,但关于诸如数字化转型的可能经济效应、数据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等,与本文高度相关,因而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在理论探讨方面,俞立平等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通过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促进成果转化,为数字贸易与新质生产力的关联奠定了理论基础^[3]。史占中提出“数字+算法”双轮驱动产业创新的框架,指出数字贸易是实现未来产业跃迁的核心载体^[4]。刘宗巍等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需求的研究,侧面印证了数字贸易对新型劳动力要素的重构作用^[5]。在实践路径方面,周楠等分类探讨互联网平台企业成长路径,提出平台经济是数字贸易的主要组织形态^[6]。徐之倡等的社会创新研究显示,数字社会创新通过开放协作模式加速技术扩散,与数字贸易的“跨境知识流动”特征高度契合^[7]。王蓼祥等基于“创新链—产业链”耦合视角,强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依托数字贸易网络实现全球协同创新^[8]。在发展数字贸易或推动数字转型所需的人才生态构建方面,高悦等对比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发展模式,指出数字贸易人才需具备“数字素养+产业洞察”的复合能力^[9]。周贵川等提出的融通创新范式,为构建数字贸易生态系统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提供理论支撑^[10]。王海等证明公共数据开放可通过提升产能利用率促进企业有效投资,揭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价值^[11]。

关于数据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微观企业层面,柏培文等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价格加成机制提升企业市场实力,为数据要素的生产率效应提供微观证据^[12]。赵宸宇等实证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使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9.2%,主要源于资源配置优化和技术创新加速^[13]。徐翔等基于研发竞争视角,证明数据要素投入可使企业创新成功率提高 15%~20%^[14]。在中观产业层面,Loecker 等的价格加成理论^[15]被沈春苗等拓展至环境规制领域,揭示数据要素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产业效率^[16]。Nambisan 的数字创业理论指出,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特征使创新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特性^[17]。李宏等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使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 8.7%,验证了数据要素的“效率增进效应”^[18]。在宏观政策层面,Park 和 Gil-Garcia 提出的开放数据创新框架,为政府数据治理提供参考^[19]。Zhou 等证明中国上市公司受益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绩效提升 12.3%^[20]。李峰等发现数字经济可使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 18.6%,主要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实现^[21]。

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张凌洁等证明数字经济可使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提升 15.3%,主要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路径实现^[22]。蔡玲等发现数字经济可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8.9%,环境规制强度具有调节作用^[23]。熊励等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0.72 个单位^[24]。在区域创新效应方面,徐政等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的“技术—组织—环境”框架,证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使创新效率提升 22.4%^[25]。王厚双和汪海峰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使城市绿色 TFP 提升 11.6%,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26]。这些发现共同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性作用。在全球比较视角方面,罗铭杰和汤凌等对比国际经验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需在三个方面突破^[27-28]:一是冉永春和陈晶晶等指出的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建设^[30];二是戴翔等强调指出的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29];三是杨松和汪宓构建的绿色数字技术标准^[31]。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不同维度和视角下的探讨和分析,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但尚未发现有针对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专文探讨,尤其是从生产力发展的“流动”本质维度的专文探讨。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着重从生产力发展的“流动”本质维度出发,深入剖析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及路径。不仅综合考量数字贸易在不同层面与新质生产力的关联,还将探讨如何利用“流动”特性,促进数字贸易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以挖掘现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的潜力点,为数字贸易和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提供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二、贸易赋能生产力发展的一般逻辑:基于流动视角的新阐释

为深入研究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赋能作用,并在实践中探索适合的发展路径,我们有必要对数字贸易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般逻辑进行简要探讨。在此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贸易的核心在于商品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即其跨境的流入与流出。因此,为深入阐释贸易对生产力发展赋能作用的一般逻辑,本研究拟从流动的新视角对这一过程进行创新性分析。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32]实际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中,早已孕育了对流动与发展的深刻理解,以及流动对发展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和深远意义。例如,深入探究《周易》,我们能够发现它不仅强调了“流动”对于事物顺利发展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流动”在塑造强大生命力与竞争力中的核心作用,从而蕴含了流动之于生产力发展中的本质作用。

《周易》乾卦彖辞揭示万物发展普遍规律,即阴阳二气循环往复实现“云行雨施”,这是万物生长的起点,彰显宇宙的主宰力量。“品物”强调事物种类多样性,“流形”体现万物变化的动态性及特定时刻的具体形态。在万物形成中,“云行雨施”代表阴阳二气的输入输出,引申为信息、资源、能量的输入输出,起关键核心作用。由此,有竞争力的生命体或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能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维持活力与竞争力。开放性是其持续发展、适应环境和进化的关键。总之,所有事物发展都彰显“流动性”,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是如此。

《周易》中泰卦与否卦对立统一,揭示事物发展的流动性本质。泰卦彖辞“泰,小往大来,吉亨。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泰卦下乾上坤,象征天地交流、阴阳和谐。乾为天、阳刚,有前进、扩张、上升的特征;坤为地、阴柔,有后退、收敛、下沉的特征。常规乾上坤下,泰卦特殊结构体现“小往大来”,反映天地交流、阴阳和谐的动态过程。因阳气上升、阴气下沉,上下卦交汇融合,形成“亨通”“安宁”的理想状态。《周易》借泰卦揭示“交”与“通”的流动性对事物最佳发展的关键作用,是万物生长的根本条件,通过天地相互作用促进万事万物繁荣发展,正面阐释流动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与之对比,否卦从相反视角揭示缺乏流动性的后果。否卦彖辞指出“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否卦乾上坤下,象征天地隔离、阴阳不交流。乾居上位有上升之性,坤居下位有下沉之性,会出现“大往小来,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局面。否卦阐释从安泰到混乱、从通畅到闭塞的转变,从反面强调“交”与“通”的流动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种流动性包括物质、信息、能量和思想交流。现实中,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都离不开动态交流,缺乏交流影响系统活力与创新。因此,否卦提醒我们警惕隔离闭塞因素,积极促进交流合作,保持事物生机活力,从反面阐释了流动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的理论逻辑,能为数字贸易赋能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启示和指导。一方面,《周易》动态系统论构成数字贸易的哲学基础,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揭示的开放系统原理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契合,数字基础设施与全球数据要素市场动态交互产生“网络协同效应”和“熵减效应”;

否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可解构为数字贸易壁垒传导机制,警示流动阻滞。另一方面,“水哲学”为理解数据要素动力学提供新视角,二者有流动特性的四维对应,包括“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长尾数据价值”“数据非竞争性”“数字技术突破”。此外,传统智慧有现代转化路径,数字丝绸之路是实践映射,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构建“双向流动”机制是泰卦“往来”思想的应用。

(二) 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历史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庸》有云:“道,不可须臾离之,可离非道也。”实则,上述优秀传统文化所阐释的“道”,即事物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蕴含的流动性本质,同样渗透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审视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力的提升历程,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流动”过程。

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可知,水系形成与分布对早期人类社会影响深远。河流与湖泊促进了人类社会流动性,在人类历史早期尤为明显。审视世界经济发展史,早期文明多源于大型河流流域,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黄河,它们提供水资源,是交流与贸易的通道。所以,水系在人类文明初期至关重要,既提供生存条件,也是文明文化传播的媒介,促进文化融合。可见,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是“流动”。

黄承梁等研究指出,自古以来,人类对物质与商品流通的不懈追求,催生了流域文明与运河交通的蓬勃发展,进而显著促进了经济繁荣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33]。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海洋文明兴起,海路畅通掀起全球化流动浪潮。海洋文明崛起改变交通方式,重塑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格局。海路畅通使远距离货物交换成为可能,丰富物质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加速不同文明的碰撞融合,促进多领域交流。全球化流动提升生产力,催生新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海洋文明兴起是全球化的关键里程碑,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新阶段,提升了世界生产力水平。自古以来,海洋文明的海上交通网络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全球生产力发展。陆上全球化流动如丝绸之路,在古代文明中也很重要,连接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周建新研究认为,丝绸之路是商品交换和思想、技术、艺术传播的通道^[34]。双向交流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科技与文化进步,为文明融合提供平台,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总之,海上和陆上的全球化流动在历史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世界经济发展史阐释了生产力发展的“流动”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和主要驱动力不同,“流动”驱动生产力发展随历史阶段演变而不同。如流域文明时代,主导要素是水力资源,流动形态是自然河道运输;大航海时代,主导要素是贵金属资本,流动形态是远洋航线贸易;工业革命时代,主导要素是机械动能,流动形态是铁路网络运输。这启发我们,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要素和流动形态具有自身特征,如数据要素被学术界公认为驱动要素,光缆传输是主要流动形态。

(三) 中国改革开放彰显的实践逻辑

先前的分析已经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流动过程。更准确地说,在中国前一轮以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为特征的贸易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实现了巨大的增长。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迅速提升了产业水平和竞争力。特别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进一步加深了与全球市场的融合,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引进,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此外,中国还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环境,即通过构建开放载体以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贸易流。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审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198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为381.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至2023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增至59359.85亿美元,出口

总额亦增至 33 790.44 亿美元。在此期间,进出口总额增长了约 155.64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约 12.45%;出口总额增长了约 186.48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约 12.93%。观察出口总额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的占比,中国已从一个贸易小国跃升为贸易大国。1980 年,中国出口总额在全球出口总额 20 017 亿美元中的占比不足 1%,大约为 0.9%;而到了 2023 年,中国出口总额在全球出口总额 23.8 万亿美元中的占比已上升至约 14.19%。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以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为例。1980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 606.3 亿美元,而到了 2023 年,这一数字已增长至 1 632.53 亿美元。相较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0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金额为 265.06 亿美元,而到了 2023 年,这一数字已增至 1 772.87 亿美元;200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金额为 1 839.70 亿美元,而到了 2023 年,这一数字已增至 29 553.99 亿美元。

可以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验证了贸易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生产力的提升及其成果,最终在具体的产业层面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着重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变革,进而反映在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变化上,对推动生产力变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论述,亦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和体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80 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 29.6%、48.1%、22.3%;而至 2023 年,这一比重分别调整为 7.1%、38.3%、54.6%。此外,产业结构内部的转型升级也反映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统计数据所示,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 13.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了 12.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了 3.4%;2023 年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 5.8%,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高达 11.9%。此外,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95 年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21 636 项,而至 2023 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到了 1 678 000 项,28 年间增长了约 77.56 倍。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的贸易大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经验和实践案例。

杭州数字自贸区“数据海关”监管沙盒实践、海尔 COSMOPlat 智能制造平台依托数字化转型、字节跳动 TikTok 算法跨境流动等,均是数字贸易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的初现。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型要素流动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关键力量。与传统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不同,数字贸易数据流动具有即时性、低成本、高附加值等特点,可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如杭州数字自贸区“数据海关”创新监管模式,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帮助企业高效利用国内外数据开展跨境业务,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支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海尔 COSMOPlat 智能制造平台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各环节数字化协同,缩短研发周期、提高订单响应速度,提升产业链生产力。字节跳动 TikTok 通过算法跨境流动,以个性化推荐算法满足用户需求,创造巨大商业价值,展示数字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总之,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及数字贸易创新探索,验证了贸易赋能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对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有重要启发。

三、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流动视角的新要求

贸易赋能生产力发展的一般逻辑,显然同样适用于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事物发展除了遵循普遍性原理外,还受其特定作用原理的影响。一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贸易相较于传统的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具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本人之前的研究也指出,社会生产力迈入“新质生产力”的新阶段,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也展现出自身特有的属性^[35]。换言之,由于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其核心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生产力跃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标志,因而与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生产力有显著区别。因此,对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作用,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应当认识到,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视角出发,数字贸易的流动亦被赋予了新的要求。

(一)流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在探讨经济发展时,我们认识到商品与货物流通是基础,但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极为重要。这些流动的多样化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商品与货物流通以成本控制和规模扩张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有详尽解释。同时,除商品、货物和人员流动外,还有无形资产流动。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生产要素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早期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的分析从劳动一项逐步扩展,现代经济学纳入多种要素,反映了经济学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随着生产要素内涵和外延的演变,贸易实现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种类和范围不断拓展,不同生产要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变化显著。尤其生产要素的直接跨境流动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要素跨境流动规模超越贸易跨境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机制。张幼文研究发现,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地表现为以资本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无论从增速还是总量来看,均已超越了货物贸易的发展^[36]。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并由此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财富增长和世界生产力大幅提升。

当前,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数字经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经济以其高效、便捷、智能的特点,正在逐步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成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数据正式确立为生产要素,使其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在全球数字经济兴起的背景下,数字贸易无疑将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狭义的数字贸易主要涵盖电子商务、云计算服务、数字内容销售、在线支付等多个领域,强调交易的数字化和在线化,使得买卖双方可以跨越地理界线,实现高效、便捷的贸易往来。而广义的数字贸易主要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商品、服务、知识产权等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和流通活动。它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电子商务,还包括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

显然,伴随着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它将成为未来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增长极,或者说建立在数字技术进步和创新基础上的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动。

(二)“数字”流动契合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需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了加快推动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新型生产要素——“数据”的流动。蔡昉等研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呈现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7]。它源于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特点在于创新,关键在于质量,本质在于先进生产力。由此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发明、发现与创新,但与以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不同的是,如前所述,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则是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换言之,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历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跃迁相比,如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本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是以数字技术为主导,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更加凸显数据及其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任保平和许瀚阳指出,在新时代背景下,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人力、资本、技能)相比,展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包括非竞争性、非消耗性、外部性、流动性、虚拟性以及边际

效益递减等^[38]。这些特性赋予了数据在构建新质生产力体系中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直接投入生产过程,发挥着直接作用;另一方面,数据在经济运行中起到桥梁作用,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石和关键组成部分,发挥着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数据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中,其独特价值和潜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据要素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所在。数据的流通和应用不仅直接创造经济价值,还通过数字技术的优化与升级,显著提高了现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模式的创新,还推动了数实融合,进而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数据要素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深入挖掘、分析和高效利用数据,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交互偏差和要素交易成本,引导创新要素流向效率更高、产出更大的企业和行业,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第三,数据要素有力推动了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涌现。作为典型的生产要素,数据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作用显著,尤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领域表现突出。张明志和张先启的研究指出,数据要素的运营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应用上,更在于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39]。这种融合催生了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开辟了高效协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增长路径。第四,数据要素展现出显著的乘数效应。通过协同、复用和融合优化知识、技术与工艺,数据要素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在新的生产率水平上,数据要素的聚变扩能进一步形成了更优的知识、技术与工艺体系。第五,数据要素的网络效应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数字经济时代,海量数据是驱动网络效应的核心要素,用于改进算法和提供个性化产品服务,产生正外部性,有力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数据要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更加积极地把握和发挥数据跨境流动的积极赋能作用,以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更何况,数据作为新一代的生产要素,其固有的流动性、可复制性、开源性、开放性以及时空跨越性,决定了其对跨境流动具有内在需求。通过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我们不仅能够促进数据资源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和高效使用,从而大幅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and 创新能力,还能在更广泛的产业领域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与发展。

四、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流动视角的新路径

在技术进步的强劲推动下,尤其是互联网与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一轮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正不断发展。这一革命性变革,逐步消除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壁垒,使得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迎来了依托数字贸易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简言之,若条件成熟且战略得当,后发国家(地区)完全有望借助数字贸易的战略机遇,重塑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与新格局,在数字技术引领的新一轮生产力跃迁中,从而把握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契机。这就要求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进程中,更加重视数字贸易,即在高质量开放中推动基于数据的数字技术及其创新活动的流通与集聚,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具体而言,基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需求,我们亟待从以下几个层面探索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一)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与投入,夯实数字贸易发展基础

数字贸易的繁荣与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坚实且先进的基础设施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基于这一认识,政府相关部门与各类企业应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与力量。具体而言,这不仅包括大幅提升网络带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还需对数据中心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优化,以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和存储能力。王亚飞和刘峻楠的研究指出,加强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5G网络的高效建设,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40],它们将为数字贸易提供更加快速、稳定的

通信环境。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提升这些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意味着需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防范潜在的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风险,以确保数字贸易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仍能保持顺畅运行的状态。唯有基础设施既强大又可靠,数字贸易才能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蓬勃发展,从而夯实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更好地发挥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在作用。

(二) 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数据跨境流动渠道

发挥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本质上要求畅通广义上的数据跨境流动。杨凯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国际贸易、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41]。这不仅需要我们加强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港口和通信网络等,更要特别关注数据跨境流动渠道的畅通。数据已成为新时代的“石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打破数据壁垒,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和高效利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应加强政策沟通,共同制定数据流动的标准和规则,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同时,需加大技术投入,提升数据传输的速度和质量,降低跨境数据流动的成本。此外,还应推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促进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数据交流与合作,共同挖掘数据的价值,推动经济的创新发展。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将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格局。

(三) 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培育数字贸易竞争优势

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生产力跃迁。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内外兼修”。所谓“内”,即依托自身的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所谓“外”,则是依托数字贸易整合和利用外部力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内”与“外”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因此,要更好地发挥数字贸易的赋能作用,同样离不开“内”的支撑,即加大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力度,以培育数字贸易的竞争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和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潜力。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我们不仅能推动数字贸易模式的根本性革新,还能显著提升交易过程的效率,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大幅增强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市场中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加强数字贸易平台的建设也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构建高效、稳定的数字贸易平台,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源,促进各类信息的广泛共享与流通,为数字贸易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此外,培养和造就一批具备高素质、专业化的数字贸易领域人才,也是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贸易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些专业人才将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推动数字技术不断进步和促进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为发展数字贸易构建优良的制度环境

本人和张二震的研究指出,规则制定的参与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强弱。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包括国际规则在内的诸多标准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关注明显不足^[42]。在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能再做规则制定的旁观者,而应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争取更加公平、优质的制度环境,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作用。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深化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紧密合作,共同深入探讨和制定数字贸易领域的新规则与新标准,确保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高效的数字贸易框架;还要在国内层面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更新,使其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从而有效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确保信息技术的健康发展。同时,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积极促进数据的跨境流动和高效利用,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价值。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构建一个公平、开放、非歧视的数字贸易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繁荣,还能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贡献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展现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8(5): 4-7.
- [2] 张二震. 条件具备, 战略正确,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3): 23-24.
- [3] 俞立平, 朱莹, 金鹏, 等. 数字化转型、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72-83.
- [4] 史占中. “数字+算法”驱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3.
- [5] 刘宗巍, 宋昊坤, 赵福全.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需求预测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137-148.
- [6] 周楠, 许昕, 蔡梦雨.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成长路径: 分类与特点[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84-95.
- [7] 徐旭初, 徐之倡, 吴彬. 从社会创新到数字社会创新: 国际实践、基本特征与经验启示[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168-177.
- [8] 王蓼祥, 刘杨, 黄涛. 基于“创新链主建—产业链主战”耦合视角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1-7.
- [9] 高悦, 张向前.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发展模式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8-16.
- [10] 周贵川, 董辉, 李坤洋, 等.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开放式创新新范式——融通创新主题研究回顾与展望[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17-27.
- [11] 王海, 叶帅, 尹俊雅. 公共数据开放如何提振企业有效投资——基于产能利用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4(8): 137-153.
- [12] 柏培文, 喻理.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格加成: 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11): 59-77.
- [13] 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21(7): 114-129.
- [14] 徐翔, 赵墨非, 李涛, 等. 数据要素与企业创新: 基于研发竞争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3(2): 39-56.
- [15] Loecker J D, Warzynski F. Markups and firm-level export statu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6): 2437-2471.
- [16] 沈春苗, 郑江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2, 42(4): 27-39.
- [17] Nambisan S.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6): 1029-1055.
- [18] 李宏, 梁宝琦, 曹知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7(4): 65-76.
- [19] Park S, Gil-garcia J R. Open data innovation: Visualizations and process redesign as a way to bridge the transparency-accountability gap[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22(1): 101456.
- [20] Zhou M L, Wang Y, Huang X H, et al. Can open government data policy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in China[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23(5): 2593-2603.
- [21] 李峰, 孙玥琪, 魏学辉.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J]. 科技管理学报, 2024(1): 61-76.
- [22] 张凌洁, 马立平.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统计与决策, 2022(3): 5-10.
- [23] 蔡玲, 汪洋. 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J]. 统计与决策, 2022(9): 11-16.
- [24] 熊励, 蔡雪莲.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效应——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20(12): 1-8.
- [25] 徐政, 占智勇, 丁守海. 新质生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策略方向[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53-65+159-160.
- [26] 王厚双, 汪海峰. 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45-58+159.
- [27] 罗铭杰.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论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2): 11-19.
- [28] 汤凌, 黄宝荣, 靳彤, 等. 欧盟 Natura 2000 自然保护地网络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2): 250-261.
- [29] 冉永春, 陈晶晶. 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驱动机制、现实掣肘与推进路径[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76-86.
- [30] 戴翔, 成鹏东, 张二震. 中国省级制度型开放水平测度及演变特征[J].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5(2): 116-161.
- [31] 杨松, 汪宓.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模式选择与价值功能[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92-104.

- [3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中国民政, 2023(17): 4-7.
- [33] 黄承梁,潘家华,高世楫.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绿色发展[J]. 经济研究, 2024(10): 4-18.
- [34] 周建新. 国际精准传播的内涵特征、方向立场与能力塑造[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10): 61-71.
- [35] 戴翔.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 103-110.
- [36] 张幼文.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全球化经济的运行机制[J]. 国际经济评论, 2013(5): 30-39+4-5.
- [37] 蔡昉,顾海良,韩保江,等. 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J]. 经济研究, 2024(7): 4-53.
- [38] 任保平,许瀚阳.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的战略选择[J]. 改革, 2024(8): 10-22.
- [39] 张明志,张先启.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1): 90-103.
- [40] 王亚飞,刘峻楠. 数字经济对就业韧性的非线性影响——兼论产业集聚的非线性调节效应[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01): 93-106.
- [41] 杨凯.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交通枢纽建设研究——以重庆为例[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51-57.
- [42] 戴翔,张二震. 制度型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与路径[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24-133.

The Logic and Path of Digital Trade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ai Xiang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flourishing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de, 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new 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dscape. To reveal the pivotal role of data factor flows in productivity leaps, elucidate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digital trade in 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 to seiz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global digital economic competi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tripartite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re essence of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low” and accordingl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digital trade empowe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first, data factors posses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non-competitiveness and spatiotemporal transcendence, and their cross-border flow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network synergy effects” and “entropy reduction effects.” Second, the broad category of digital trade is becoming the core carrie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its development level show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growth in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the increase in value-added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Third, China needs to construct a dual-circulation pathway of “Digital Silk Road + DEPA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while ensuring data security. The conclusion demonstrates that digital trade under high-quality opening conditions can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through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data factors.

Keywords: digital trad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ata f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责任编辑:邹柳馨]